■中国共产党思想史

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观点随感

□宋贵伦

2004年4月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后，中央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基本经验”的重大研究课题交由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承担。北京市委高度重视，成立了以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龚育之、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为首席专家，以中央党政军研究机关和首都高校、市属研究部门专家构成的课题组。

龚育之同志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共党史专家、教育家、自然辩证法研究专家。他担任首席专家后，不顾体弱多病，亲自指挥研究，多次抱病参加课题组会议等研讨活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一）“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最初，中央交办课题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基本规律”。课题组讨论时，认为规律难以把握，而且容易空泛。根据大家意见，在2004年9月24—26日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将“基本规律”改为“基本经验”，并指出，“基本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基本规律。规律就是经验的总结。”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指出，用“基本经验”比“基本规律”更易接受，可把经验总结达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此项建议得到上级的批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考虑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在2004年9月课题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龚育之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要按理论发展的过程来概括。在2005年1月13日和以后几次课题组会议上，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从“三个历史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三大理论成果”的角度来概括，即：三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三个阶段；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他还对三个历史阶段提出了深刻见解。认为，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来划分，三个历史阶段可表述为：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并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以前算准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创立的，毛泽东只是作了探索。

（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民族化结合起来。”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首先谈了这个问题。此后不久，以《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问题》为题，先后被《学习时报》和《人民日报》刊发，在理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龚育之强调，应当把民族化、时代化这两点突出出来。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

他特别强调，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只讲民族化，不能忽视时代化，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结合。

（四）“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着重研究‘化’出了什么特殊的东西。”在2006年5月7日的课题组会议上，龚育之同志围绕如何处理史、论的关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不能离开历史，但完全按照史的线索来写，就是党史而不是思想理论发展史了，侧重点应当是为什么要“中国化”，特别是“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他又进一步论述了这个观点，指出：“所谓独特的东西，一方面是指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一方面又是指它同马克思主义既有的东西有相异之处。需要研究：这些独特的东西是怎么得来的？是怎么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得到检验和证实的？还要分析：‘化’的过程中哪些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引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的东西？哪些是不符合中国情况又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中国革命和建设招致损失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克服这些失误，走上和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道路的？要把回答这些问题摆在突出地位，既不是完全摆脱历史的叙述，又不是完全依附在历史的叙述里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出了新民主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化’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突出‘探索’两个字。”这是2006年6月17日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龚育之同志强调的第二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从不成熟到成熟、成熟了又不成熟、还要再探索的过程。

他还特别强调两点：第一，成功是探索、失败也是探索。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探索的过程，而建党初期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时期的陈独秀，无论贡献和失误都属于探索的过程；建国后，党和毛泽东的成功和错误也应从成功的探索和失误的探索来分析和看待。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熟了，又会陷入新的不成熟，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又面对着许多新的问题，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民族化方面继续做出新的创造性的探索。

在2005年1月13日课题组会议上，他还明确提出，眼界要宽。在绪论写作中，不仅要表现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对于也是马克思主义发端的、又同马克思主义若即若离、甚至分道扬镳的其他理论支派，既要批判，也要客观评价、恰当判断。

（六）“新出来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原来的东西有所不同，这才是创新，巨大的重要创新”，“甚至有时被认为是‘异端’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异端”问题》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讲话的标题。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包含许多重大的甚至被某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异端’的创新。比如，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不是以城市为中心；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而不是工人等等，就被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有点“左道旁门”，有点“另类”，有点“异端”。他说，邓小平也说过“异端”问题。邓小平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有些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他还介绍说，这句话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小册子中没有收入，在编辑《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时，经邓小平本人同意恢复了。

龚育之同时强调指出，对“异端”要分析。有属于创造性发展的“异端”，也有自以为创造性发展，其实却属于错误的东西。比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就曾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的创造性发展。是否是创造性发展，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

（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三大拨乱反正”和“三大理论创新”。这是龚育之同志在首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上提出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三大拨乱反正”，是指从“两个凡是”到实事求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大理论创新”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

（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要在求准、求深、求实、求共识基础上求新。”这是龚育之同志2005年12月16日在课题组会议上讲话的重点，以后又反复讲过多次。他既强调创新，更强调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强调要在准确、深刻、实在上下功夫。他还特别强调，因为这部著作是集体著作、是基本读物，要在相当范围里有共识或可以求得共识。在求共识的基础之上，努力求新，力求思考得新、概括得新、文字表达得新，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求新。

今年6月12日，龚育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他的逝世，不仅对我们课题组是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中共党史界也是极大的损失。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6·25”重要讲话，研读龚育之同志有关重要观点，我有如下一些粗浅体会：

第一，坚持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原则，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发展过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大致经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至1949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探索时期（1949年至1978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至今）三个近30年的历史阶段；出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相继探索出了两条成功的道路：一个是新民主主义道路，一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四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上下篇又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重大创新。其中，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有三大创新：统一战线论、武装斗争论和党的建设论，这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有三大创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创造的。

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从不同角度概括和总结。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当从“化”出了什么独特的东西角度来总结，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应当从如何“化”的角度来概括。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可以概括为坚持“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和“五个有机结合”。

“一个中心”即：以现实问题和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是毛泽东、邓小平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和党中央反复强调的。这是最基本的经验。

“五个有机结合”一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统一，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国情特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二是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统一，把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吸纳现实创新成果结合起来，形成反映规律、富于创造、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三是坚持领袖创新与群众创造相统一，把党的领袖及其领导集体的创新与理论家的创造、群众的智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具有政治权威、学术价值、深入浅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四是坚持务虚与务实相统一，把研究理论与制订路线、方针、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立足当前、面向长远、治国理政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五是坚持独特与包容相统一，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体系完备、重在建设、开放包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这五个方面是对“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的进一步展开，是基本经验。当然，这个归纳和概括只是个人的粗浅体会，还极不成熟，只是抛砖引玉。

第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不断推动理论创新。

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坚持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坚持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就是要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新成果，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基本问题研究

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

□徐 春

科学发展观本身从多个角度包含着人的全面发展内容。其中，“以人为本”原则的提出就是保证社会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价值核心，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人为本”从来是具体的、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凝固的。把握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内涵，既要确定“人”的含义，还要理解“本”的含义。在当代中国，以人为本主要是以人民为本，但又不能把以人为本仅仅理解为就是以人民为本，“人”比“人民”的外延更宽泛，内涵更丰富，更具包容性。“本”字，则一般是指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以人为本”不是一个存在论和认识论的命题，而是一个价值观命题。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赋予了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明确的价值内涵，一方面强调作为市场主体的人的价值，另一方面针对市场经济存在“物化”现象，提出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把不断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政治、文化及其他社会事业，本身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的生存、发展、幸福才是目的。

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还有遥远的历史差距，但是，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将会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可能条件：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了道路；第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经济前提；第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高度建设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思想文化前提；第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建设将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政治前提；第五，丰富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建立将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发展走向和谐会极大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表面看，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的主要是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问题，但从深层次看，它要解决的则是人本身的持续发展问题。人的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从类的角度来理解，它一方面指人类整体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另一方面也指人类的世代延续与发展。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人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处于不同发展时间的每一代、每一代里的每一阶段的人们的发展权都是不能剥夺的，本代人不能牺牲后代人的权利，任何时代的个体和群体均拥有相应的生存权、发展权和享受权。从个体角度来理解人的持续发展，它主要指人自身的体力、智力、才能、创造力，以及各种潜能得到持久的、充分发展。人自身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人作为主体，其实践活动、社会关系、人的需要、各种能力、潜能素质的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动态的永远追求过程，没有终点。

科学发展观中包含人的可持续发展内容，意在需要妥善处理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使它们协调一致求得互动。并通过全面教育，提高人的素质，实现人口与社会其他因素之间的相互适应与协调发展。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许多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从而形成社会系统全面进步和不断更新的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属于不发达阶段。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根本的任务还是发展生产力。只有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为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首要任务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的素质和生活质量，由此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达到全面性，取决于他有多少“自由时间”或闲暇时间，即超出为谋生所必须花费的时间。一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越发达，个人花在谋生上的时间越缩小，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在其他方面发展自己。这就是说，社会生活水平越高，个人的发展空间就越广阔。人的全面发展也有赖于精神文明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实现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里，存在着数字化鸿沟的国民是无法参与世界竞争的。知识经济需要的个人是全面发展的人，若没有全面发展的个人，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只有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真正的科学发展。

（上接第一版）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问题上的创新，突出表现在把体制改革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起来。胡锦涛同志明确地指出：“推进体制创新，是解决经济社会诸多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努力形成一套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求是》2006年第1期）这种体制机制改革包括：第一，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真正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第二，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步伐，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和企业经营业绩考核体系，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第三，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督，使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第四，加强现代化市场体系建设，进一步打破行政性垄断的地区封锁，完善商品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加快建设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第五，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支持企业扩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把引进外资同提升国内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结合起来，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企业改革改组改造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改革开放方案，不仅为我国今后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而且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发展和改革虽不能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内容，但却是这一科学体系中的两个主要理论支点。近30年的实践证明，能不能坚持发展和改革，坚持什么样的发展和改革，关系到我们事业的兴衰成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坚持了科学发展和正确改革，也就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国在发展和改革中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印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唯一正确的指针。

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向全党发出的战斗号召。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巩固已经取得的成绩，坚持科学发展，继续深化改革，使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取得新的进展，使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变化。同时也要正视和应对前进道路上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我们在实践过程中必然会面临许多困难、风险和各种不可预测的因素。只有不断克服矛盾，认真解决问题，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进。

当前，在我们遇到的矛盾和问题中，比较突出的一是人民内部利益关系亟待调整，一是经济发展方式亟待改变。人民利益关系不协调，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过大，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所有制除少数个体经济外，都是公有制，分配方面基本上是平均主义大锅饭，社会不同成员的收入分配基本拉平。但这种表面上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束缚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妨碍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广大人民生活改善都极为不利。目前出现的人民内部利益关系的不协调，是转型时期的阵痛，是改革开放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解决这类矛盾和问题，只能通过持续发展经济，继续深化改革，决不能开历史的倒车，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老路上去。党中央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政策措施，着力调节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重点保障城乡低收入群体和贫困群体的生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得到了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只要我们沿着这条正确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够缓解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必要条件。

我国经济的连续快速增长，已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但在经济高速运行中，也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倾向，其中较突出的就是资源、能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严重。我国每一万元GDP的物耗、能耗和排污的数量都高出发达国家好几倍。由于能源紧缺、能耗过大，我国对外能源依存度越来越大，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能源安全。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如不转变，资源、能源的瓶颈制约就难以打破，环境污染就会日益严重，经济运行就不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经济社会的良好发展势头也必然难以为继。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央早有察觉，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经过连续几年的治理，目前情况已有所好转。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复杂，牵扯面广，它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相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打破坚冰，开通航道，有效实现从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式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在神州大地乘风破浪一往直前，任何困难、挑战都撼动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各族人民的信心和决心。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排除艰难险阻，继续奋勇前进。